



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五部门于8月13日联合发出通知，核心诉求是希望从根子上治理“烧钱办晚会”问题，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

近年来无论是晚会的成本还是明星的身价都越来越高，晚会和电视栏目已经偏离了其本身应该具备的文化功能和意义，越来越成为套取国家财产、滋生腐败的“黑色链条”。5部门的联手整治行动，有望成为斩断“黑色链条”的一记重拳。

华丽不再，综艺晚会如何转身？

■ 罗锋（合肥）

“烧钱办晚会”近些年愈演愈烈，很大程度上人们认知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即办晚会就是砸银子，而由各级政府机关和国企主办的晚会，因被外界普遍认为存在贪腐问题更是备受各界质疑，饱受舆论诟病。

“疯狂的晚会”与功能错位

坦诚的说，节庆晚会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其浓郁的仪式感与现场参与感共同建构了一个社区、地区，乃至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社会记忆，在维系社群凝聚力层面上更是承担着重要功能。随着媒介技术变迁，节庆晚会的现场仪式不断突破时空限制，为更多人所分享。1983年，央视首次举办春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今天已过30载的电视晚会栏目发展到今天已绝非一档电视栏目那么简单，它俨然已经成为重要的传媒文化事件，并因此与主流意识形态建立了紧密联系。但与此同时，节庆晚会与其初衷却渐行渐远，最终导致功能错位，“烧钱办晚会”便是其极端的疯狂表现。

2012年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叶惠贤给出了一组数据：一台晚会最低成本1000万元，一个新年，仅“上星”台跨年晚会便有40多个，成本约5亿。倘若数据没有多少出入，按照40万元办一所希望小学来计算，仅此一项成本便可建1250所希望小学，可资助16.7万名贫困儿童。而上述的换算仅限于“上星”台跨年晚会的成本。关于目前国内的演出市场，据业内人士介绍，即使一场普通的乡镇晚会花费至少数十万元，而大型晚会动辄则要花费5000万元以上，按此推算，大大小小的各类晚会演出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成本支出。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濮存昕就曾直言，“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有这么多晚会”，“什么事情都能办个晚会”。

市场导向与奇观效应依赖

五部委联合通知显然剑指利用政府财政资金为各类节庆晚会活动买单，

但超级晚会的场域内部并非政府一极，另一极恰恰是超级晚会发动媒体机构本身。以电视为例，无论学界、业界如何呼吁“绿色收视率”理念，如何要求减轻收视率在整个电视节目评价体系中的权重，但在目前利益回报模式中对广告依存度依旧高达90%的状况下，加之其他如中国电视自身创新能力不足等诸多因素，导致同一时间段内、同类型节目扎堆涌现，跨年晚会便是这一现象的最佳注脚。而要在这样的“血色场域”内杀出一条血路，烧广告商的钱巨邀请超级明星参加已然成为各个电视台拉升收视率的重要保证。于是，耀眼明星、炫目的舞美灯光及快节奏的镜头剪辑所叠加的视听奇观已经将节庆晚会原初的文化社会功能挤干榨尽。

当我们仔细审视这个场域中政府与媒介两大巨头时，双方都具有充足的“烧钱”冲动，当时机成熟时，两者的结合将不断刺激推高“烧钱”的速度与规模。当年央视《同一首歌》这一原本属于公益性质的电视栏目凭借特殊身份形成对演出市场的相对垄断，在一年接近四、五十场演出中获取巨额利润。《同一首歌》虽然已经被叫停数年，但是其中蕴含的政府与媒介之间复杂暧昧的关系却依旧存在，“烧钱”冲动依然具有复燃的土壤与气候。

关于“疯狂的晚会”，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介，我们都是从生产者角度来观察的，而当我们视线转向晚会的受众时，这个群体身上所显露出来的问题严重性丝毫不逊于前者。

在当下中国文化生态中，像超级女声、快乐男声、日韩剧、清宫剧、谍战剧、美剧、抗日神剧、好莱坞大片这些词汇无疑为我们拼凑出一幅具有众多追随者的流行文化地图。如此观察或许有几分卫道士的口气，似乎用批判的眼光打量这些流行文化现象属于一种文化保守观念，忽视了其中蕴含文化民主与文化多元精神，因此常被外界讥笑。然而，只要我们稍加留心便会心生疑问，为何这些文化现象中都具有一个典型特征，即对视听奇观有着近似于偏执狂式的执着。问题恰恰在于此，豪华晚会所着力营造的视觉盛宴与极致视听效果，在满足了受众视听奇观胃口同时又进一步将其推入奇观依赖症的深渊。最为严

重的后果是，多元文化生态最终走向奇观效果为唯一审美准则的文化气候。笔者在此无意于探讨造成这一文化审美缺陷的复杂原因，只是想呈现一个现实，即政府在使用行政手段整治晚会奢靡风气时所面临着一种怎样畸变失衡的文化生态。

接地气与文化多元

治理“烧钱办晚会”，提倡节俭节庆，五部委的通知无疑已经取得了显而易见的成效，然而这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继电视晚会之后，电视大型综艺节目也已经成为奢靡浪费的重灾区。今年全国卫视数十档歌唱选秀节目，超豪华的导师阵容几乎把华语乐坛所有的明星大腕一网打尽。据说每位导师的出场费都是以百万计，身价过千万者也不乏其人。现在人们担心的是，一旦电视晚会的生产规模与投入成本因为受限而转投综艺栏目，那么其产生的负面影响将会超过晚会，有关部门需提前打好预防针。

虚火、充满泡沫的文化市场当然需要治理，但治理的最终目的绝非仅仅在形式上压缩减少节庆晚会规模，更非杜绝节庆晚会，其最终诉求应该是构建一个“接地气”的文化市场，一个能容纳各类文化审美趣味的文化场域，进而形成一个能够满足各社会阶层审美取向的多元文化生态，从而恢复节庆晚会的原初功能。

电视综艺节目也可借此机会显示原创的力量。目前国内火爆的节目绝大多数都是花重金从国外买来的，巨额的版权费和制作费让每个参与角逐的电视台不堪重负，甚至是举全台之力豪赌。在这一点上大陆不妨借鉴台湾的综艺节目：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台湾已经形成了以访谈、游戏、才艺、美食等为主要内容的综艺节目板块，在内容和形式上贴近群众的欣赏习惯，主持人和嘉宾都收取很少的酬劳，营造出一种简朴、热烈、人情味浓郁的文化氛围，用热情和诚心打动观众，而非狂野的视听轰炸。

反对荧屏奢靡之风并非什么新鲜事，此前各种呼声不断，但愿此次能从根上起效，让中国的荧屏文化回归本身的意义。

名著保护立法势在必行

■ 孙仲

最近，新版电视剧《武松》因为出现“武松爱上潘金莲”的桥段，引发了各界热议。除此而外，该剧还对武大郎和王婆的形象进行了改动：武大郎不再胆小怕事、逆来顺受，而是敢爱敢恨，甚至想到了用生孩子和杀死西门庆的方式留住潘金莲。王婆则不再老态龙钟脏兮兮，而是既年轻又漂亮，既有爱心又有凤月场味道……

真是不可思议，武松和潘金莲青梅竹马，武大郎变得“高富帅”，王婆风情万种……这些究竟是“基于生活”的推理，还是导演或编剧的个人推理？如果原著人物形象可以如此“推理”，那么，作为梁山首领的宋江，是不是可以找小三、养情人？花和尚鲁智深，是不是可以有女相好，甚至是私生子？孙二娘，是不是可以既卖肉包子，又搞色情交易……请问，什么样的颠覆找不到“生活推理”？难道就因为能找到所谓的“生活推理”，便可以随心所欲地乱编一通吗？

名著，可以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文化遗产，极具传承价值。《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不仅历史悠久，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生活，而且好多还流传到国外，受到了外国读者的喜欢。名著中栩栩如生的人物



许丽/画

形象，已成为口口相传的公共认同，甚至成了国家文化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虽说“一千个读者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在中国，好多名著中脍炙人口的角色却在人们心目中有着不容撼动的一致解读。然而现如今，却有人偏偏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做出了“武松爱上潘金莲”、“曹操和周瑜玩三角恋”这样的雷人颠覆。

我们不禁要问，谁赋予了某些人乱改名著、肆意颠覆原著人物形象的权利？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人享有作品不受歪曲、篡改的权利。就算名著的作者已经过世，相关权利也应由其后人或国家享有，作为其他个人或制作单位，凭什么乱改原著的内容，甚至是主题？按照今天的价值观去解读名著及其人物形象，说轻点是自以为是为，不尊重别人；说重点，就是侵权、违法，应当受到处罚。

然而至今，尽管影视界翻拍成风，颠覆成癖以及观众中怨声载道，板砖横飞，却未见哪部影视作品及其制作者因为乱改名著而受到处罚。如果现有的著作权法及其它相关法律不足以对乱改名著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那么，是不是该专门出台一部用于保护名著、保护名著中经典人物形象的名著保护法呢？这看上去有点不着边际，或不好操作，但其必要性，却是不容置疑的。至少，值得有关方面思考和探讨。

当然，除了法律制裁，还有别的办法可以约束有关颠覆名著的行为。比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更应从严把把关。

如何保护名著，既要靠有关改编、制作者自觉，也要靠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严格把关，同时还要靠观众切实监督。必要时，真的应走立法之路。无论如何，不能再让某些人或某些制作单位，抱着“死无对证”的无赖心理，而对名著及其经典人物形象胡乱改编，肆意颠覆了。

第三批禁止出境文物名单出炉

国外观众若想一睹子龙鼎、四羊方尊等西周青铜器的真容，只能到中国国家博物馆来参观了。国家文物局日前公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包括上述两件青铜器在内的94件(组)一级文物禁止到境外进行展出。

根据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出国(境)展览管理规定》，历代出土古尸；宗教场所的主尊造像；质地为象牙、犀角的文物；元以前书画、丝作品以及宋、元有代表性的孤品瓷器五类文物禁止出境展出。

此次公布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含青铜器、陶瓷、玉器、杂项等四类，列入目录的94件(组)一级文物自即日起禁止出境展出。(据《北京晨报》)

点评：中国人历来有“穷大方”的传统，自己屋子里的一点宝贝，恨不得全拿出来让人看，如果听到两声赞美，大脑一热送出去一点也未必不可能。禁止国宝级文物出境展览，这在国际上是传统和惯例。这其中不仅出于对珍贵文物的保护，还有对自身文化骄傲和自信。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文化地位也在逐步上升，禁止国宝出境，显示出了中国的“底气”。

艺术电影期待排片制度化

新近成立的“上海艺术电影联盟”，让钟爱艺术电影的人们欣喜、赞叹。在“联盟”的设计中，每日放映艺术电影的，不但有常设的定点影院，还有地理位置最佳的商业影院一起加盟。而且，这种加盟不是表表姿态，是有铁板钉钉的承诺：每天至少排映两场艺术电影，票价基本定于50元。

长期以来，受院线排片的影响，艺术电影常常遭遇“一日游”命运，上映一两天就被商业电影挤走。观众想看的艺术电影看不到，不想看的商业电影却是密不透风、铺天盖地。久而久之，立志拍摄艺术电影的导演们不得已改行，痴迷艺术电影的忠实观众日渐零落……

点评：艺术电影就像芭蕾舞、交响乐一样，在国外是受到企业家赞助和国家资金扶持的。上海艺术电影联盟的做法显然是想从产业链的角度，来完善艺术片的功能。然而让地理位置最佳的商业影院放艺术电影，这事总让人感觉有点愚。尤其是在贺岁档等大片云集的档期，让影院放着大把的钱不赚而去放艺术片，恐怕影院老板和员工都不会答应。



国家大剧院打造民乐“印象”

8月26日和27日，国家大剧院将出现这样的景象，从售票处到水下走廊，从扶梯到剧场，到处都被民乐演奏装点着，每一处都是当晚在这里演出的《印象·国乐》的一道景观。由印象系列导演王潮歌率领的印象团队将为中央民族乐团打造一台《印象·国乐》的演出，从演出形式上打破原有的民乐演出形式(上图)。

据悉，王潮歌执导这部《印象·国乐》只收取一元导演费用，而《印象·国乐》将对曲目、表演、舞美、服装做出大胆革新创新，着重突出中国传统水墨画、山水画的风格，在大写意的意境中叙述人的情感。视觉设计中大量融入时尚元素：突破传统服装的局限，结合现代时尚设计，将古典与时尚完美结合，以服装诠释思想，从视觉演绎国乐，全方位表达《印象·国乐》之美。(据《北京青年报》)

点评：不知道王导这次玩的是实景艺术还是行为艺术，从现有的消息来看，这次演出改变最大的是空间的突破和服装的变革，力争突出“国际范儿”。国乐的精髓在于静心倾听、细心品味，感受简单的丝竹之声所营造出的氛围。而王导这次要用视觉来演绎国乐，恐怕是有点舍本求末了，十二女子乐坊固然成功，但是如果满台满屋都是女子乐坊，那只能说是不伦不类。

受聘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

方力钧向“体制内”转型

■ 陆云红

近日，当代艺术家方力钧受聘出任中国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使其再次成为关注的焦点。面对网上关于“招安”的滔滔言论，方力钧似乎并不想辩解。不仅面对媒体坦然说出“谢谢‘招安’我吧”，甚至还在受聘当晚22时许，发了一条表明自己在雍和宫的微博，颇有些淡泊与超然的意味。

生于1963年的方力钧在“知天命”之年完成了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重大转型。中国国家画院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美术“国家队”。它是文化部直属，集美术创作、研究、教育、收藏、普及和交流于一体的国家公益型事业单位，其前身是中国画研究院。目前中国国家画院下设国画院、书法篆刻院、油画院、版画院、雕塑院、美术研究院、公共艺术院和青年画院。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当代艺术研究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国家画院的研究已经覆盖各个艺术门类，备受争议的当代艺术也成为画院的一个重要研究项目，也由此让当代艺术家有了体制内的跨越。



方力钧的标志性作品

在相当长时间里，中国当代艺术一直处于在野状态下蓬勃发展，但近几年官方体制也开始慢慢接纳当代艺术。2009年11月，由罗中立任院长的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这是首个研究当代艺术的官方机构。2011年，中国当代实验艺术又被中国美协纳入了其大家庭，成立了实验艺术委员会。

出生于传说中“邯郸学步”的学步桥附近的方力钧6岁时第一次拿起画笔，临摹样板戏连环画《红灯记》。先后从河北轻工业学校陶瓷美术专业、中央美院版画系毕业后，“骄傲”的方力钧选择做一名自由艺术家。当时这种以自由名义放弃体制内分配的人，被称为“社会盲流”。

方力钧的作品太符合西方对中国的简单想象，于是印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与崔健的摇滚乐、王朔的小说一起，成为中国上世纪90年代初的精神象征。与此同时，王广义、岳敏君等一批同质艺术家被集体发掘出来。那时还没有太多批评的声音。在那个庞大的机制面前，他们是“说不”的英雄。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院成立时方力钧便是其中的一员，而此次出任国家画院当代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对其来说则是拥有了更多体制内的头衔。方力钧说自己在国家画院的工作是没有薪酬的。“我之后的工作会对当代艺术成果进行整理、梳理，以及学术研究上的跟进。显然这是一个困难的工作，另一方面画院是一个创作机构，我们还要把创作做好。”